

10%左右,如此小的比重,怎么能使产业“空心化”呢。更何况当年日本还引进海外直接投资215亿多美元。

近几年来,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除了日元升值等因素之外,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也是重要因素。所以想用日元贬值抑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是做不到的。要解决日本目前的经济困难,只有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的步伐、搞活国内经济才是良策。

2. 将加剧日本金融机构的“惜贷”现象

日本金融机构的海外融资(包括部分风险资产)多以美元计值,而当日元贬值时,折合成日元的这部分资金则会膨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日本金融机构自有资金的比率则会降低。为满足国际清算银行自有资金比率最低为8%的要求,金融机构必须通过增发股票或依靠政府注资来增加资本金,否则必须减少风险资金,如果是后者,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下降。因此金融机构将进一步加剧“惜贷”,而这对日本经济的打击不可低估。

3. 将损害日本海外投资企业和国内消费者利益

几年来,由于日本制造业纷纷到海外投资生

产,海外生产比率迅速提高(从1985年度的3.0%提高到2000年度的14.5%),日本在海外的投资企业将产品再出口到日本的也越来越多。但是日元贬值后,这些企业的产品再销往日本将遇到很大困难。他们抱怨说,为支持国内的结构改革而到国外投资生产,而现在的日元贬值政策却使他们陷入困境。这些年,虽然日本经济不景气、企业倒闭增加、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日本通过进口海外物美价廉的商品,满足国内的需求,不仅稳定了物价,广大消费者也获得了实惠。但日元如继续贬值,今后进口物价将上扬,就会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并给日本社会增添不稳定因素。

4. 日元继续贬值对日本是一种巨大风险

日本诱导日元贬值的政策,已被很多日本人称之为非常危险的“卖国政策”。若如日本进一步推动日元贬值,并成为一种趋势,在日本超低利率政策的驱动下,今后日元的跌势将不可阻止,可能出现暴跌。因为不仅日本人会比过去更加积极购买外币、外国的国债和股票,增加其外汇资产,以减少损失;海外的投资家为回避风险,也会将其手中拥有的22万亿日元的国债、24万多亿的日本股票抛售出去,从而形成“抛售日本”的风潮。

印巴冲突的历史和地缘考察

傅小强

由于印度在南亚的地缘位置和综合国力远胜于巴基斯坦,因此巴基斯坦在冷战时期选择与美国联盟与印度对抗,印度与原苏联结盟,印巴对抗成为美苏争霸在南亚的表现形式,巴美、印苏两组力量的较量决定了印巴对抗与冲突的性质和前景。冷战结束后,印巴对抗发生了明显不

利于巴基斯坦的变化,但1998年的印巴核试验再次使两国在核对抗上达到大致平衡,因而略显倾斜的南亚总体战略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印度“亚太化”和美国对印巴定位变化促使印巴对抗逐渐超出南亚地缘范围,是印巴对抗成为亚太主要安全关注议题之一的内外力量。在全球

化和新经济时代,印度的大国地位虽然呈现上升趋势,美国等西方大国日益看重印度潜在的巨大市场和人才资源,并相继将其南亚政策逐渐向印度倾斜,但“9.11”事件和印度国会恐怖袭击案后,西方国家开始重新调整其南亚政策,伊斯兰极端势力因素、核因素、反恐怖因素成为这些国家考虑南亚政策的重要条件,今后有可能逐步介入印巴对抗,从而将使印巴对抗逐渐被纳入更宏观的亚太安全环境和全球安全层次。

一、冷战时期:从单打独斗到结盟对抗

印巴之间的对抗从1947年印巴分治就开始了,两国之间的对抗在冷战时期曾三次达到最高层次,即1947年、1965年和1971年的三次印巴战争,印巴对抗和冲突是南亚地区安全最棘手的问题。印巴对抗的基本原因是英国殖民统治遗留下的历史问题,双方在种族、宗教、领土方面存在严重冲突,克什米尔归属问题是两国之间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巴基斯坦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处于南亚次大陆的边缘地带;而印度居南亚次大陆的中心,其他国家分别与它交界或毗邻,这种特殊的地缘构成和不平衡状况使印度在南亚处于支配地位。自1947年分治伊始,巴基斯坦便一直以南亚强国印度的对手身份展现在世界面前。但在南亚区域内,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力量对比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巴基斯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印巴对抗中处于弱势。仅从领土面积、人口规模和自然资源这三项主要的权势基值 and 对抗资本来看,分治之初印度的国土面积(126.96万平方英里)和人口规模(3.57亿)均为巴基斯坦的4倍,工业实力是巴基斯坦的10倍,主要工业资源几乎都集中在印度境内。1971年之前,巴基斯坦的国土被印度一分为二,彼此相距1500多公里,不仅如此,印巴边境还无天然屏障可守,经由公路、铁路、水陆或者空中,印度很容易便可进抵巴基斯坦境内;1971年东巴独立建立孟加拉国后,巴基斯坦便由南亚大国变为一个中等国家,印巴力量对比失衡更为严

重。

印度在南亚的压倒性权势地位,加上独立后民族精神的催化作用,印度明显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世界大国所具有的潜能,这直接导致印度政治精英在印巴对抗中致力于谋求南亚霸权体制,独立后积极推行“印度主义”,将南亚整个地区视为一个单一的战略实体,而印度是其安全与稳定的唯一保证。而印巴毗邻的地缘现实使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在印巴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状态下始终面临来自印度的严重威胁,由于仅凭自身实力巴基斯坦无法在印巴对抗中摆脱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状况和印度威胁,因此为寻求与印度平起平坐,巴基斯坦在战略上实施用联盟来对抗“印度主义”,即与区外大国结盟、借助联盟的力量减轻地区力量的严重失衡状态,于是印巴围绕霸权与反霸权开始了全面较量。

独立之初,巴基斯坦几乎找不到一个可在印巴对抗中为巴基斯坦提供援助的可靠朋友或盟国,因而巴不得不将伊斯兰教作为特殊的掩体,视穆斯林世界为其外交基石。为此,巴基斯坦大力倡导“伊斯兰斯坦”思想和“穆斯林北约”计划,甚至明确提出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应组建成一个联邦。事实上,巴基斯坦加强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为寻求对抗印度的战略纵深和后方支援。但是,由于巴基斯坦处于穆斯林世界的边缘地带,再加上穆斯林国家内部分歧及对印态度不一,因此,巴基斯坦不得不另寻盟友。

为对抗印度,巴基斯坦逐渐利用自己在大国全球战略中的地缘政治价值与西方国家结盟,以满足自己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需要。随着美苏冷战的全面展开,南亚对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地位上升,而印度当时对与美结成军事联盟持保留态度,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相反巴基斯坦则对美国集体安全条约的提议反应积极,美巴双方的利益交叉使两国关系迅速升级。1954年5月美巴签署《相互防御条约》,同年9月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组织,次年9月加入《巴格达条约》,巴基斯坦成为“美国在亚洲最密切的盟国”。受美巴同盟刺激,印度与苏联也加紧靠拢,美苏双方各自在该地区找到了战略支撑

点,国际冷战的大气候与南亚地区印巴对抗相结合产生了南亚战后战略格局的雏型,这种美巴-苏印对抗格局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

然而,结盟并没有使印巴对抗完全回归平衡。由于美国将其总体战略利益置于印巴对抗之上,在巴基斯坦需要援助的关键时刻后撤,在关键时刻美并没有真正帮助巴。1971年巴基斯坦被肢解。在得不到美国实质性援助的情况下,于1972年与印度签署了《西姆拉协议》,但《西姆拉协议》并没有化解印巴对抗与冲突。究其原因在于: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态势不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该国与区域外大国在联盟内的不对称地位以及他们对威胁轻重缓急的不同认识和对联盟的不同期望,决定联盟力量主要被用来服务于大国的利益和战略需要。在大国主宰下,联盟的本质是求均势,而“均势原则的逻辑之一是,必须优先考虑主要均衡力量的需求,其次才能考虑次要均衡力量的需求,总体均势的重要性必须优先于任何局部的或特殊的均势。”

二、冷战后时期:从小冷战到核对抗

冷战期间,南亚是世界上冲突频发地区之一,印巴对抗是影响该地区安全的主要矛盾。造成印巴长期对抗的根源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加以理解:(1)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彼此争夺,介入南亚地区事务,造成有关国家,特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之间长期处于敌对和武装对峙的状态;(2)地区内部国家之间、南亚国家与地区邻国之间因领土、资源、跨界民族和移民等问题引起的争端与冲突;(3)印巴两国内部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社会动乱“外溢”为印巴对抗或冲突。冷战结束后,虽然大国介入这一导致印巴对抗的外部因素消失,但印巴之间所固有的在领土、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矛盾却并未得到缓解,低烈度的冲突反而变得越来越频繁了。

冷战结束后,印巴之间的冷战仍然存在。对这一判断最好的说明是:印巴各自的军火来源体系虽然已经发生变化,但双方的军备竞赛依旧。印巴均各自把半数左右的常规兵力部署在两国

边境地区,都将对方作为头号假想敌。90年代,印度是俄罗斯的最大军火市场,俄罗斯向印度出售军火的交易额约占印度军火进口总额的75%,范围包括苏30战机、T-90主战坦克、雷达、军舰等,同时也向印度出租核潜艇和航空母舰。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普勒斯勒修正案后,冻结了向巴基斯坦出售的30架F-16战机,此后美巴之间的军火交易基本终止,巴基斯坦不得不开始加强自主开发能力,同时转向欧洲军火市场及其它国家购买常规武器。据美国研究机构一份评估报告称,印巴两国90年代年均军费增长幅度约为25%。由于印度经济实力远强于巴,而且购进先进军火的量大速度快,因而印度在印巴常规军备竞赛中与巴基斯坦的差距逐渐拉大,巴基斯坦承受的军备压力沉重。90年代,印度每年大约将GDP的2%用于军备,巴基斯坦为GDP的5%,并且其总军费开支只相当于印度的1/8,而印度军队为巴基斯坦的2倍强。

冷战后,南亚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印巴对抗的外部环境由“印俄-巴美四国双对抗”特点逐渐向印巴两国之间的单一对抗方向发展,外部介入力量逐渐减小。90年代以来,印巴冲突的频率有所增加,1998年印巴核试后这种对抗特点更加明显。由于外部力量介入减弱,南亚战略平衡进一步向印度倾斜,“巴基斯坦游离于敌对大国之间的战略变得不那么得心应手了”,这种趋势促使巴基斯坦不得不另辟蹊径与印度对抗。

在印巴对抗中,克什米尔仍为双方冲突的核心问题。巴基斯坦从宗教立国的原则出发,认为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克什米尔归巴领土。如果巴基斯坦承认了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克什米尔是印度的领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赖以立国的根本原则;而印度则始终否定穆斯林赖以立国的“两个民族理论”,认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虽然宗教信仰不同,但同属一个民族,因此反对穆斯林以宗教立国。如果把克什米尔划归巴基斯坦,则等于承认了“两个民族理论”,多民族、多宗教的印度担心这会打开“潘多拉盒子”,导致印度“巴尔干化”。事实上,克什米尔问题已成为印度与巴基斯坦极为敏感的国内政治问题。印巴历届政府

都面临着国内的重大压力,谁都不敢做出重大妥协,冒出卖民族利益的罪名。由于克什米尔问题实际上已成为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的象征,而且与国内的党派政治纠缠在一起,差不多使这一问题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90年代以来,印巴对抗逐步升级,其中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围绕克什米尔的争夺,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和防御上的需要,印巴都很重视克什米尔的战略地位。巴基斯坦认为,面对强大的印度,巴基斯坦缺乏战略纵深,如果失去了克什米尔,巴基斯坦的侧翼会完全陷入印度的包围之中,从而使巴在与印本不平衡的力量对比中处于更为不利的态势,为此,巴前总统齐亚·哈克称克什米尔是巴基斯坦的“生命线”。对印度而言,完全占据这块邻近中国、阿富汗和中亚的重要地区,可以断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陆上联系,并可将印度的国防前沿推到阿富汗一侧。这样,在将来的印巴冲突中,巴基斯坦便完全被与其邻近的大国分离开,有利于增强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上的压力。

克什米尔争端是导致印巴对抗的主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一些南亚问题专家认为,即使克什米尔问题得到了解决,印巴关系短期内也难以完全改善。因为,如果没有克什米尔,必定还会有其它的问题。长期困扰着两国的冲突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即历史上和心理上的根源。印巴分治时的相互仇杀和三次印巴战争已使两国之间互不信任和敌视的心理根深蒂固。

1998年5月,印巴两国相继进行核试验而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拥有国,标志着印巴对抗进入了一个新的动态平衡阶段。事实上,在没有公开核选择以前,由于印巴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巴基斯坦已不能跟上印度军备竞赛的步伐,印度的战略优势越来越明显,印巴对抗逐渐变得对印度有利。但1998年印度首先进行核试验,促使巴跟进,从而使印巴对抗上升到更危险、更难把握的核对抗平台,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威慑作用事实上可以起到抵消印度常规军备优势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印巴对抗在军事意义上差不多又处于同一水准了,核对峙又将印巴对抗带入了大体战略

平衡的新阶段。印度军事评论家在印度国会恐怖袭击案后曾评论说,“说不清印度首先进行核试验是得到了更大的战略优势呢,还是失去了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军事优势。”

核对峙已成为印巴对抗的屏障和限制条件,并且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印巴双方都存在首先进攻的动力。印巴均未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甚至公开宣称“保留对印度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力”,印度虽拥有相对绝对的常规武器优势,但也未明确将巴基斯坦排除在核打击之外。印度的理想战争模式是既要利用其在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方面的绝对性优势,消灭巴基斯坦军队,又要在伊斯兰堡准备对印度的核设施进行第一轮核打击之前摧毁巴基斯坦的核设施。因此,巴基斯坦必须全力提高核武器的机动灵活性,提高其生存率。印巴两国因而都将核武器运载和投放工具作为优先考虑,1998年核试以来,印度已试验过6次“烈火”中远程导弹试验,而巴基斯坦也进行过两次“高里”中程导弹试验。

民族宗教对立情绪加深了印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两个民族、两个宗教、两个国家”的理论是在英属印度时期由伊斯兰联盟首先提出的,后来成为“伊盟”坚持要求与印度分治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个理论认为,在印度,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有完全不同的信仰和社会生活方式,分属两个民族,印度应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而印度教徒是不承认这个理论的。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一直反对根据两个民族的理论实行印巴分治。尼赫鲁始终认为在印度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同属一个民族,仅有宗教信仰的差异,没有民族差异。民族与宗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只是在“伊盟”的坚决要求下,为了避免全面内战,为从英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独立,国大党才不得不接受了分治的痛苦现实。当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再次提出“两个宗教,两个民族”的理论时,印度将其与英国殖民主义时期的做法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认为美国的做法是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表现。印度政府始终坚持认为,印度是个多民族国家,在

政治制度上实行政教分离,是一个各民族、各宗教平等的世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能依宗教信仰的差异来划分社区和实行分治,甚至分裂;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更不能以宗教信仰来举行公决,强调“两个宗教、两个民族”的理论就是分裂克什米尔、分裂印度。印度政府决不接受这种观点。

90 年代以来,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思潮逐渐上升,1998 年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后,印度教民族主义更是恶性膨胀,国内要求对巴基斯坦实行强硬政策的鹰派势力占据上风,以内政部长阿德瓦尼为首的鹰派在格尔吉尔冲突后都主张不与巴基斯坦对话,单方面解决克什米尔等问题。而与此同时,90 年代以来巴基斯坦国内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也得到发展,民众的伊斯兰情绪上升较快,极端势力甚至主张以圣战方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民族情绪方面的对立进一步加深,这更使印巴对抗变得根深蒂固。

“9.11”事件后,印巴为捍卫各自根本利益,争取利用民族宗教问题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国际地位,印巴双方在如何定义“跨界恐怖主义”问题上僵持不下。印度认为,克什米尔的穆斯林武装多为恐怖组织,部分与拉丹的基地组织有联系,这些穆斯林武装组织一直在印控克什米尔和印度国内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而这些组织背后有巴基斯坦的支持。因此,印度打击“跨界恐怖主义”的目的,实质是在不搞军事对立的条件下加大打击克什米尔穆斯林游击队的力度,最终消除巴基斯坦插手印控克什米尔的借口,达到将印控克什米尔永久纳入印度版图的目的。而巴基斯坦对印度的企图心知肚明,只主张与印度谈判广泛意义上的恐怖主义问题,坚持回击任何可能导致将克什米尔穆斯林武装纳入恐怖主义组织的提法。在 2001 年印巴首脑会晤中,当印度要求在《阿格拉宣言》草案中加入打击克什米尔“跨界恐怖主义”的条款而又不承认克什米尔是“有争议”地区时,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不得不结束此次首脑会议,因为巴基斯坦承认“跨界恐怖主义”就可能失去在克什米尔活动的正当性,穆沙拉夫本人则

将失去军方和国内宗教政党的支持,甚至可能引发国内动荡。

三、对抗的新发展:从南亚走向亚太

1998 年核试验后,特别是在“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势力等问题逐渐成为全球热点话题,在此背景下,印巴对抗逐渐成为亚太安全的一个重要议题。从地缘政治上看,印巴地处南亚,属于广义上亚太地区的一部分。从地区力量上看,印度的迅速发展及其东向政策使印度与亚太地区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印度在亚太安全中的地位上升,亚太大国对印巴对抗问题也更为关注。从亚太大国关系来看,美、日等都重视发展与印度的关系,逐渐倾向于将印度扯进亚太安全体系,因而印巴对抗逐渐成为了亚太安全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等大国对印巴关系的调整也反映了印度在亚太地位的提高及印巴对抗在亚太安全中的地位。印度和美国内外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使印巴对抗在亚太安全中的位置显著上升。

印巴对抗在亚太安全中的地位上升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其在亚太安全对话机制中的份量有所加重。特别是在 1998 年核试后,由于印巴对抗可能给地区及国际军控、核不扩散等方面带来破坏性影响,因而印巴对抗在亚太安全中的份量明显加重。1998 年 6 月,克林顿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就印巴核试验和印巴对抗进行了磋商,这是中美两个亚太大国的最高领导人首次就印巴对抗问题进行磋商。1999 年 9 月,来自亚太地区 20 国的陆军司令在新加坡召开为期 4 天的太平洋陆军司令会议,议程包括东帝汶动乱、台海紧张、南沙问题和印巴对抗等问题。近几年在美国军方、学界等对亚太地区安全隐患的评估中,一直将印巴对抗视为亚太地区四大安全隐患之一(另外三个分别是朝鲜半岛、台湾、南海问题)。印度加尔各答《电讯报》2001 年 5 月的一篇社论评论说,“不管怎样,随着中美之间开展冷战可能性的增长,无疑会使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的重要性加大。在今后的亚太大国关系中,美国因素将越来

越多地影响中印关系,对印巴关系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应该看到,印度“亚太化”是印巴对抗在亚太安全中的地位上升的内因。最近两年,全球地缘战略重心出现了向亚太转移的兆头,美、日、中、俄、东盟逐渐成为亚太战略格局中的主要力量,印度长期困于印巴对抗,有被日渐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印度决心以挤进亚太为突破口,实现争当一流大国的愿望,同时借此进一步确立在印巴对抗中的优势地位。2000年6月2日,印度外长贾斯旺特·辛格在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院发表题为《印度与东盟:2000年的安全模式》演讲时强调:“印度的安全考虑参数已明显超越南亚地理定义的范围,南亚经常是定位印度安全的一个含糊范畴,就印度的面积、地理位置、贸易联系和经济规模而言,印度关注的安全环境以及潜在的安全考虑包括从海湾到马六甲海峡的印度西边、南边和东边地区,西北边的中亚,东北亚的中国和东南亚。”2001年4月他访美时更向美国表示,印度在从海湾到南海地区拥有“广泛的战略利益”。由此可见,印度战略定位目标就是要成为亚太大国。

为此,印度与亚太大国美、日、中以及东盟的关系正变得日益密切。2000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印度时表示,“印度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小布什上台后,甚至还批评克林顿把中国当成亚太地区的中心是个错误,要在建立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的亚太安全框架时发挥印度的作用。美国各类国防政策规划和亚太安全战略报告均十分强调联合军事演习的作用,认为联合演习能够体现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近年的相关报告更是将印度和越南等国纳入须重点拉拢的对象。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谢尔盖·伊万诺夫2000年4月也在莫斯科表示,俄在建立亚太地区安全体系方面的基本政策是,同该地区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东盟国家等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平等、均衡的合作,明显已将印度作为亚太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力量。印度政府也多次提出愿意和东南亚国家联合巡逻,以剿灭海盗的建议,2001年初先后与新加坡、越南、日本、韩国

联合举行军事演习。

由于印度日益“亚太化”,因而印巴对抗也日益染上亚太地区主要问题的色彩。亚太各国在讨论地区主要安全威胁的时候,经常将印巴对抗作为一个主要问题,这也逐渐为亚太各国所接受,美国尤其热衷于此。

事实上,美国对印巴定位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因素是促使印巴对抗在亚太地位上升的外力。美国在冷战时期将印巴视为大致平等的地区强国来看待,而现在美国已日益倾向于将印度视为与中、日大致平等的“亚太大国”,而巴基斯坦则为地区强国。因而美国在看待印巴对抗问题时,更倾向于将其作为亚太热点问题,并且更多地从亚太安全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来考虑。美国对印巴的战略调整和对克什米尔政策变化也是导致印巴对抗形式变化的重要原因。1990年,美国以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为由停止向巴提供经、军援助,在政治上对巴施压;对印却不仅给予许多经济实惠,还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改变其原来立场,甚至还向印提供军事装备生产方面的合作。这是美对南亚地区战略的重大变化。

在印巴对抗的症结点克什米尔问题上,9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倾向于要印巴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避免自身在该问题上承担某种义务。冷战时期,印巴两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及两国克什米尔政策受制于冷战的“零和动力学”。巴美关系密切时期,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战略能得到美国承认。而印度坚持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美国的反苏反共条约组织,美国对其深为不满。在“不反共即反美”的外交哲学鼓噪下,当时的美国务卿杜勒斯便曾指责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是“不道德的”。为迫使印度接受美国观点,美国一方面利用巴基斯坦制衡印度;另一方面利用克什米尔问题插手印巴关系。巴基斯坦以公决形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主张,得到美国在安理会等诸多国际场合的支持,美国也乐于充当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仲裁者。印巴核试后,美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关注已转向防止印巴爆发核冲突。与此同时,美与印在经济、反恐等方面的合作却不断加强,关系日益密切。当然,美印走近并不

意味着今后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会偏向印度,美国在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方面仍需巴基斯坦的合作,虽然印度曾多次提出要将巴基斯坦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但均被美国否决。总体看,美南亚政策出现“偏印”的调整使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外部环境趋向有利,加之其国力远胜于巴基斯坦,因而立场趋于强硬,导致双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不断加剧。印度利用战略优势不断挤压巴基斯坦,在坚持以往政策的同时,对克什米尔穆斯林武装加大打压力度;而巴基斯坦则积极支持克什米尔穆斯林武装与印度对抗,扶持克什米尔“第三力量”,努力将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

“9.11”事件后,印巴对抗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更显著了。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态度十分坚决,对极端伊斯兰势力和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态度变得极为谨慎。由于克什米尔是穆斯林武装活动频繁的地区,在克什米尔的穆斯林武装中,有个别属于与拉丹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组织,有些属于主张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多数组织或多或少地在使用暴力手段,因此美国更加关注南亚的稳定问题及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打击问题。印度国会遭恐怖袭击后,美国为防止印巴对抗打乱其反恐战略部署,一方面敦促巴基斯坦打击在克什米尔和印度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并没有全盘否定巴基斯坦支持的克什米尔武装组织;另一方面,美国也积极介入劝和,防止印巴发生大的冲突。因为一旦印巴再次在克什米尔发生冲突,不仅可能刺激巴基斯坦国内穆斯林的情绪,而且可能激发新的恐怖暴力活动,地区不稳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战略将受到严重干扰。这样,美国今后在提升美印关系时,不得不从地缘战略、反恐战略、对伊斯兰世界战略等更高的视角来看待印巴对抗,因而印巴对抗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也将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美国并行发展与对印、巴关系已成为美国对印巴对抗的新态度。“9.11”事件后,美国对印巴的策略调整十分迅速,在重新重用巴基斯坦反恐的同时也加强了构筑美印军事合作关系的步骤。2001年上半年,布什政府先后派副国务卿理阿米蒂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访印,并取消了对印度的经济制裁,阿富汗战争大局落定时更加快了美印军事合作的步伐。国际舆论猜测,布什政府似乎准备进一步放宽对印的出口限制,其中包括向印出售军事和航天领域的尖端技术,印度有可能购买美国武器系统。当然在与印改善关系的同时,美国也力求在印巴之间维持相对平衡。7月,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布莱尔在访问斯里兰卡时表示,美印关系不会以牺牲巴基斯坦为代价。9月初,美国会要求布什政府超越核扩散问题,提升美印军事关系。美前驻印大使瑟勒斯特接受印报采访时透露,军事合作是加强美印战略联系的第一步。布什政府不再把印看作核问题国家,而当作有益的地区平衡力量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支持者。

美国虽然希望印巴对抗今后能有所缓和,也希望再次促成印巴首脑对话或会谈,可是问题在于美国对印巴的政策,特别是在核扩散问题上,有其自相矛盾之处。这种自相矛盾不仅不利于印巴关系的缓和,反而有可能加剧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首先,获得核大国的合法资格是印度发展对美关系的重要战略诉求。如果美国向美印军事合作注入实质内容,公开承认印度的核地位或满足印度对核技术的要求,将会从根本上动摇冷战后建立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连锁效应可能危及美的自身安全利益。其次,在印巴之间,美国实际上是“拉印抑巴”,不可能搞绝对的平衡。在导弹扩散等问题上,可能会对巴方不断施加各种压力,而对印方导弹发展计划则少有阻拦。这势必加剧印巴在导弹方面的实力差距,制造新的战略不平衡,引起巴方的不满,激化印巴矛盾。